

冷戰年代
世界與中國

叢書主編
沈志華

陌生的兄弟

(1949—1965)

中國與民主德國
關係史初探

葛君
著

開明書店

本書係華東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精品力作
培育項目（2023ECNU—JP002）成果

叢書總序

/ 沈志華

「冷戰」這個概念，在國際上已經流行多年，而在中國使用這一概念，基本上已經到了冷戰結束的時候。所謂冷戰，一方面是指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在相互對抗時期的外交戰略，即冷戰戰略；一方面是指人類世界進入了以美蘇對抗為標誌的兩極結構的歷史時期，即冷戰年代。

對於冷戰歷史的研究早在冷戰進行期間就已經在西方開始了。不過，這一研究真正全面展開和深入則是在冷戰結束之後。這不僅是因為作為一個有始有終的完整過程，冷戰此時已經可以納入歷史研究領域了，更重要的是蘇聯和東歐各國檔案的開放，為研究者提供了審視鐵幕另一邊歷史真相的豐富而不可或缺的史料。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冷戰史新研究」或「冷戰國際史研究」，而中國學者正是在這個時候加入國際冷戰史研究隊伍的。在新史料面前大家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這也是中國學者在冷戰史研究領域可以同國際學者對話的原因之一。

中國學者研究冷戰歷史十分必要。持續了近半個世紀的冷戰，不僅深刻影響着國際關係的演進，也對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發展道路產生了深刻影響。中國雖然不像東、西歐國家那樣處於美蘇對抗的核心地帶，但也不像多數第三世界國家那樣處於冷戰的邊緣地帶。中國是一個大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又處在美蘇兩個大國對抗的中間地帶，實在無法擺脫與冷戰的糾葛。一方面，美蘇之間的冷戰不斷影響着中國內政外交的發展演變，另一方面，中國內政外交的變化又反作用於冷戰的進程。從某種意義上講，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在冷戰的環境中誕生、成長、壯大的。

從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對外政策的制定和發展道路的選擇來看，中國與

冷戰的糾葛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49年到1950年代末。中國加入社會主義陣營，向蘇聯「一邊倒」，全盤接受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模式。收穫是在蘇聯的大規模援助下，實現了現代科學技術向中國的第一次大轉移，建立了工業化基礎。責任是充當社會主義陣營的急先鋒，挑戰現存國際秩序，對抗美國和西方。第二階段，整個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中國脫離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高舉世界革命大旗，四面出擊，既反美又反蘇，還要打倒一切反動派。在國內大搞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是共和國最孤立、最困難的時期。第三階段，1970年代初期到1980年代中期。中美和解並建交，從策略協調到戰略合作，聯手制蘇，建立起「準同盟」關係。中國進入現行國際體系，放棄世界革命，結束「文化大革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第四階段，1980年代中期到冷戰結束。中國奉行獨立自主外交和不結盟政策，與美國保持戰略合作，與蘇聯實現關係正常化。對內提出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着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外全面開放，實現了現代科學技術向中國的第二次大轉移。可以看出，在冷戰年代，中國無論在對外交往還是在經濟建設方面，是一步一步走向成熟了。最重要的是處理國際問題和對外關係的理念發生了重大轉變，即對時代的看法從戰爭與革命轉向和平與發展；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從破壞國際體制轉向進入並維護現存國際體制；外交理念從意識形態主導轉向國家利益優先；外交方針從同盟（陣營）外交轉向不結盟的全方位外交。顯然，這其中確有很多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值得總結，值得借鑒。

冷戰結束至今已經三十多年了。現在，由於中美關係惡化乃至形成對抗，人們都在熱議「新冷戰」。大國之間圍繞利益和權力展開的對抗，國際政治中出現的對峙和遏制，似乎重演着冷戰年代的是是非非。我個人不太贊成「新冷戰」已經形成的說法。如果說「新冷戰」就是冷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再現，那麼應該看到，目前中美關係雖然已經處於對抗的狀態，但冷戰的基本特徵——因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對壘而形成的世界兩極格局尚未出現。所以，說「新冷戰」已經出現或必然出現，為時尚早。當然，歷史

往往出現驚人的相似，當前中美關係的演變與當年美蘇走向冷戰的道路也確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是歷史究竟會走向何方還存在很大變數。正如恩格斯所說，「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的，……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¹而目前國際社會的各種因素都在變化當中，尤其是美國和中國的政策取向，不僅取決於主觀因素，也會受到諸多客觀因素的影響。這些變化在目前尚未鎖定，尚待觀察，但是這種現象在已經結束的冷戰歷史中曾經出現，已成定數。歷史研究者的責任就是發現它們，讓人們了解它們，以為今天的借鑒。由於當代世界的結構性因素和重大國際問題的淵源都與冷戰時期密切相關，所以，冷戰史研究可以為理解和把握後冷戰時期的歷史運動方向、應對及管理現實的國際危機，提供必要的歷史借鑒和戰略性評估。這也是進一步全面、深入地加強冷戰國際史研究，並在學科建設方面將這一研究提高到應有地位的現實意義所在。

有鑒於此，香港中華書局與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策劃了這套「冷戰年代的世界與中國」叢書，期待着在重新描述歷史過程，重新構建歷史事實的過程中，拓寬中國冷戰史學者的思路，開掘冷戰史研究的新材料，以推動中國冷戰國際史研究的繼續拓展和深入，促進中國現代史、世界現代史、現代國際關係史和國際政治學研究的發展，同時也為中國參與國際事務、制定對外政策提供學術支撐和決策諮詢。

2024年5月於上海

1 《恩格斯致約·布洛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頁。

緒論

一、研究的緣起

冷戰史研究，自從 20 世紀 90 年代初以來，在研究方法、範疇、視角以及對研究對象的認識上取得了許多突破性的成果，從而產生了「冷戰史新研究」(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的學術思潮。「新研究」何以可能？其中的首要條件在於史料利用上的突破，由於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研究者們開始有機會接觸並利用來自「鐵幕另一邊」——原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檔案史料，在這樣的條件下，無論從史料上還是從史觀上，研究者們都得以擺脫「舊研究」當中難以避免的「西方中心論」乃至「美國中心論」。¹

大量新史料的解密與利用，使得針對冷戰時期蘇聯以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歷史的研究不再淪為一種「經院哲學」或「宣教學」，² 從此真正具備了成為科學的歷史學的條件。於是，對「鐵幕另一邊」的歷史研究成為「冷戰史新研究」中的一個重要領域。通過對原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檔案進行細緻的研讀之後，研究者們開始發現，冷戰時期社會主義陣營內的國家間關係存在着以往一般國際關係理論難以解釋的特殊現象。這就更需要歷史學者在合理的新歷史證據的基礎上，建立起自己的概念、分析框架和理論模式。³

1 參見陳兼、余偉民：《「冷戰史新研究」：源起、學術特徵及其批判》，《歷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

2 德國歷史學家漢斯-烏爾里希·韋勒 (Hans-Ulrich Wehler) 在談到前民主德國的歷史學時，指出這時的歷史學在一定程度上只能被稱為「經院哲學」，還難以被稱為科學研究。德國的東德史學家赫爾曼·韋伯 (Hermann Weber) 同樣認為，民主德國的歷史學研究本質上是德國統一社會黨的宣傳工具。這在冷戰時期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中是具有普遍性的。參見韋勒：《服從國家使命的歷史經院哲學：民主德國的歷史學家》，載韋勒：《21 世紀初的衝突》，周惠譯，桂林：瀟江出版社，2015 年，第 194—195 頁；Hermann Weber, “Western GDR Research and Historiography in the GDR,” *European Education*, Vol. 24, No. 4, 1992, pp. 73-74.

3 沈志華：《冷戰國際史研究：世界與中國》，載沈志華：《冷戰中的盟友：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國家關係》，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年，第 20、24—25 頁。

在討論冷戰時期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時候，有一個理論範式似乎頗具解釋力，那便是「帝國」。它最先被用來解釋冷戰時期蘇聯與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性質，其源頭甚至可以追溯到 1968 年 8 月底，當以蘇聯為首的華約集團成員國出兵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後，中國正式將蘇聯定性為「社會帝國主義」。¹ 這個概念在當時雖然是中國攻擊蘇聯的一個政治口號，但也確實在某種程度上揭示出了當時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客觀現實，即蘇聯把東歐國家當作自己的「殖民地」，並通過經濟「援助」和軍事「援助」的手段實施滲透和控制。² 而隨後蘇聯提出的「有限主權論」更是這種「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直接反映。

到了 21 世紀初，冷戰史與蘇聯史學者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 (Vladislav Zubok) 將其論述冷戰時期蘇聯歷史的著作命名為《失敗的帝國——從斯大林到戈爾巴喬夫的冷戰中的蘇聯》，他意圖將冷戰時期蘇聯的政策與行為置於一個更為廣闊的「帝國」語境中予以考察。祖博克指出，斯大林很早就將蘇聯視作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帝國」，從 20 世紀 30 年代開始，在蘇聯已經出現了類似把自己視作偉大沙俄帝國繼承者的宣傳。³ 在這一語境下，二戰後蘇聯在東中歐地區的政策就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建立「帝國」秩序的政策。

在論述冷戰時期中國與其他亞洲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時，這種「帝國」範式似乎同樣有效。中華帝國的傳統宗藩體制和「天下」觀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處理自己與朝鮮、越南、蒙古這些社會主義鄰國的關係時似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如，毛澤東在處理與朝鮮關係的過程中，有意無意地閃現出中國傳統的「天朝」意識。⁴ 而古代中國的「天下」秩序原本就隱含着華夷之分、內外之別、尊卑之異的因素，可以說與一種建立新秩序、包容每一寸土地、

1 《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總破產》，《人民日報》1968 年 8 月 23 日，第 1 版。

2 《什麼是「社會帝國主義」？》，《人民日報》1968 年 8 月 30 日，第 4 版。

3 Vladislav M. Zubok, *A Failed Empire: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pp. 1-3, 19-21.

4 沈志華：《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 (1945—1976)》，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 年，第 704 頁。

四海如一的「帝國」並沒有區別。¹

這種「帝國」範式之所以有效，無非是由於蘇聯和中國在各自的歷史上擁有「帝國」傳統以及與此相關的經驗。東中歐的一些國家，像波蘭、羅馬尼亞等國歷史上就處在沙俄帝國的影響範圍內，同樣，歷史上的朝鮮、越南等國也長期隸屬於中華帝國的朝貢體制之中。可是，對於那些跳脫出蘇聯和中國各自「帝國」歷史經驗範圍的國家間關係，諸如中蘇關係、中國與東歐國家關係，就似乎很難再從「帝國」這個範式路徑進行闡釋。

這於是就要求學者們從具體的歷史研究過程中對冷戰時期社會主義國家關係作更具普適性的理論思考。最受矚目的自然是對冷戰時期中蘇關係的研究，目前這一領域內已經湧現出了大量而又豐富的學術著述。² 其中，沈志華為冷戰時期社會主義國家關係指出了一種研究思路，即它們在結構上不同於一般意義的現代國家關係，由於受到意識形態和歷史傳統的影響，其內部運行的政治準則有着某種特殊性。³ 因此，若要進一步從此出發推進對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理論思考，把握其內部運行的準則及其特殊性，還是先需要先拿出更多的個案並對它們進行實證性的歷史學研究。

本書所想要敘述的便是冷戰時期社會主義國家關係諸多個案中的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關係，通過對其進行初步的史

實研究和探討，試圖對如何理解冷戰時期社會主義國家關係提出一些新的觀察角度。

二、研究的對象、現狀及史料

本書所要研究探討的是從 1949 年到 1965 年這一時期內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兩國關係的歷史。在此有必要先對本書研究對象的概念予以界定，並對目前學術界圍繞這一問題的研究現狀以及本書所利用的檔案史料進行綜述和說明。

（一）研究對象的概念界定

一般情況下，本書將用「民主德國」指稱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用「聯邦德國」指稱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不過在以往的研究文獻和原始檔案中，出於在德國問題¹上的政治傾向、外文原文以及文字簡潔的需要，會用「東德」來指稱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用「西德」來指稱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當本書引用這類檔案文獻時，仍將「東德」「西德」這些稱謂保留不變，目的在於準確還原史料的本真語境，並不意圖表達任何的政治立場或傾向。同時還會使用「東西德」或「東、西德」這樣的措辭來統稱民主德國與聯邦德國。

本書在此之後出現的「中德關係」這個概念僅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關係，並不會以此來指稱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關係。不過本書所探討的「中德關係」並不局限於中國與民主德國這兩個國家之間關係，同時也涵蓋了且不得不涵蓋這兩個國家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與德國統一社會黨——之間的關係，這是由這兩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體制所決定的。

1 葛兆光：《對「天下」的想像：一個烏托邦想像背後的政治、思想與學術》，《思想》2015 年總第 29 期，第 30、54 頁。

2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Odd Arne Westad, e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Washington, D.C. and Stanford: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迪特·海茵茨希：《中蘇走向同盟的艱難歷程》，張文武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 年；薛衛天：《中蘇關係史（1945—1949）》，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年；沈志華、李丹慧：《戰後中蘇關係若干問題研究——來自中俄雙方的檔案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年；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 年；Lorenz Lü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Sergey Radchenko, *Two Suns in the Heavens: the Sino-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 1962-1967*, Washington, D.C. and Stanford: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沈志華：《無奈的選擇：冷戰與中蘇同盟的命運（1945—195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Jeremy Friedman, *Shadow Cold War: The Sino-Soviet Competition for the Third World*,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5.

3 沈志華：《無奈的選擇》，第 20 頁。

1 本書所指的「德國問題」，概念較為寬泛，將凡是與冷戰時期兩個德國相關的外交、政治問題都囊括在內，如德國的重新統一問題、對聯邦德國的立場與政策、民主德國謀求外交承認的努力以及處理西柏林問題等。

（二）研究現狀綜述

學術界對於中國與民主德國關係的歷史研究，可以說才剛剛起步，在這方面首先由國外學者率先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最早涉及這一主題並具備學術價值的文獻大概是由德國女記者卡蘿拉·施特恩（Carola Stern）於1966年所撰寫的一篇論文，她利用了當時的公開材料，梳理了1949—1965年間中國與民主德國關係發展的基本線索，並指出，在1955年和1960年這兩個年份，兩國關係發展出現了階段性的轉折。¹

前民主德國的退休外交官約阿希姆·克呂格爾（Joachim Krüger）曾於1980—1983年擔任民主德國駐華使館參贊，是兩國關係部分歷史的親歷者。德國統一後，他利用了解密的前民主德國檔案，撰寫了一系列關於民主德國對華關係的學術論文，並主編了一部論文集，內容幾乎涵蓋了兩國關係發展的整個歷史時期。不過，他的研究仍以概述兩國關係的基本發展為主，基本仍停留於描述宏觀歷史脈絡這個層面，對於較為具體而複雜的歷史細節問題討論不足，問題意識也顯得不夠突出。²

第一部比較全面概述中國與民主德國關係史的專著出自法國學者克洛迪·加爾代（Claudie Gardet）之手。³ 她在自己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於2000

年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關係（1949—1989）》一書，此書將時間跨度從1949年到1989年的兩國關係史劃分成了四個階段，每個階段正好為十年，但是，這樣的劃分顯得過於生硬，也不符合兩國關係發展的歷史邏輯。而且本書對於中國與民主德國關係的敘述仍停留在基本的歷史概述層面，因此，與其說是一部史學研究著作，反倒更像是一本大事記，並且更多側重於民主德國的對華政策，對中國的應對和行為論述不足。¹

妮科爾·施圖貝爾（Nicole Stuber）的研究相比較而言就顯得更具有問題意識。她的博士論文《中蘇衝突下的東德對華政策（1956—1966）》試圖揭示在中蘇關係背景下的民主德國對華政策所呈現出來的特點。作者認為，在1960年之前民主德國的對華政策並沒有受到中蘇衝突的影響，特別是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和中印邊界衝突等問題上，民主德國表現出某種不同於蘇聯對華立場的「特立獨行」。直到1960年之後，民主德國才開始與中國在意識形態上發生衝突，但到1966年為止，民主德國並不像蘇聯那樣想要同中國徹底決裂。作者同時還指出德國問題在民主德國對華政策當中的重要性。² 施圖貝爾的研究給出了一個正確的方向和研究視角，準確把握中蘇關係的發展脈絡，對於理解民主德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她的研究還被一部較權威的民主德國外交政策史著作引用。³ 可是問題在於，當施圖貝爾將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視為中蘇衝突的起點時，就已經注定了她由此所得出的一系列關於民主德國在對華關係上的那些「獨特性」的結論還需要重新接受檢視。

除了施圖貝爾的研究以外，國外學者對民主德國與中國關係的研究還涉

1 Carola Stern, "Relations between the DDR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1949-1965," in William E. Griffith, ed., *Communism in Europe. Continuity Change and the Sino-Soviet Dispute*, Bd. 2, Cambridge: MIT Press, 1966, pp. 97-154.

2 克呂格爾的研究成果如下：Joachim Krüger, „Die Volksrepublik China in der Aussenpolitischen Strategie der DDR (1949-1989)“, in Kuo Heng-yü und Mechthild Leutner, hrsg., *Deutschland und China: Beiträge des Zweiten Internationalen Symposiums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Berlin 1991*, München: Minerva Publikation, 1994, S. 43-58; „Zu Gast in Peking. Die DDR und die VR China in den 80er Jahren“, *WeltTrends: Zeitschrift für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vergleichende Studien*, Nr. 2, 1994, S. 133-144; „Das letzte Jahrzehnt der Beziehungen der DDR zur Volksrepublik China“, in Mechthild Leutner, hrsg., *Politik, Wirtschaft, Kultur: Studien zu den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Münster: Lit Verlag, 1996, S. 63-76; „Das China-Bild in der DDR der 50er Jahre“, *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Band 25, 2001, S. 258-273; „Das erste Jahrzehnt der Beziehung“, „Die parteiinternen China-Informationen der SED-Führung 1969-1988“, in Joachim Krüger, hrsg.,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Beziehung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 Erinnerungen und Untersuchungen*, Münster: Lit Verlag, 2002, S. 65-111; 163-171.

3 Claudie Gardet, *Les relations de la République de Chine et de la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Allemande (1949-1989)*, Bern: Peter Haupt, 2000.

1 Kreissler Françoise, "Claudie Gardet, Les relations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et de la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allemande (1949-1989)," *Perspectives chinoises*, No. 64, 2001, pp. 68-70.

2 Nicole Stuber, *East German China Policy in the Face of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56-1966*,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é de Genève, 2004.

3 Hermann Wentker, *Außenpolitik in engen Grenzen: Die DDR im internationalen System 1949-1989*, München: Oldenbourg, 2007, S. 168, 271-275.

及一下這些主題：民主德國與中國的文化關係和藝術比較；「對華國際」¹時期的民主德國與中國關係；「新東方政策」下的東西德與中國的關係。² 國外學者的研究主要依靠 1990 年德國恢復統一之後前民主德國和德國統一社會黨的解密檔案，而基本上沒有能利用中國的檔案文獻，因此，在史料利用上的局限性和傾向勢必導致他們的研究也或多或少地是以民主德國為中心的。

所以中國學者的研究可以在中方檔案史料的運用上展現出自己特色，但是這項工作同樣剛剛起步。以往的國內學者要麼集中於研究從晚清到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史，要麼就關注當前中國與聯邦德國的關係現狀，唯獨對於 1949—1990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西德關係的歷史研究尤為不足，即便在一些學術專著當中有所涉及，但也基本停留在一般性的概述層面，在中德雙邊檔案史料運用以及具體歷史細節的研究方面都存在着不小的缺憾。¹

近些年來，中國的一些青年學者已經有意識地開始利用中德兩國的檔案撰寫中國與民主德國關係史的學術論文，這些論文一定程度上還原了兩國關係過程中的一些具體細節，並嘗試從不同的視角切入進行分析，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¹ 而本書將在吸收、繼承和批判以上研究的基礎上利用來自中德雙邊的檔案文獻進行實證研究，以下對所利用的檔案文獻再作一些簡單的介紹。

（三）研究所用史料概況

從 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前德國統一社會黨、前民主德國以及原蘇聯以及東歐各國在冷戰時期的歷史檔案紛紛得到解密、整理與公開。在德國這被稱作一場「檔案革命」(Archivrevolution)，它真正徹底地解決了東德史² 研究中「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困擾，擁有前輩學者們所完全無法接觸到的新史料直接意味着一個個全新的研究領域等待着研究者去佔領，於是使得自從德國統一以來，東德史研究的成果呈現為一種「井噴」的狀態。³ 這其中很大部分都屬於「填補空白」式的研究，對於民主德國與中國關係的研究也屬於此。這就必然要求新的研究必須建立在利用前民主德國和德國統一社會黨檔案的基礎上，而本書主要利用的德方檔案大致由以下幾個部分組成：

1 「對華國際」(Interkit) 是由蘇共中央主導，定期召集對華問題討論的會議機制。從 20 世紀 60 年代末至 80 年代中期，每年輪流在蘇東集團國家的首都召開系列會議，主要由各個黨的中央國際聯絡部領導人參加，他們在會上分析中國的對內對外政策，了解中共領導集團內部的情况，商討對華方針問題。蘇共召集這些會議的目的是想要在其集團內部形成一條反華戰線，但這一目的並未完全實現。

2 Martina Wobst, *Die Kultur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 1949-1990*, Münster: Lit Verlag, 2004; Daniela Dahlke, *Der Sozialistische Realismus: Ein Vergleich der Malerei in der VR China unter Mao Zedong und in der DDR 1949-1976*, Saarbrücken: Verlag Dr. Müller, 2010; 貝恩德·舍費爾：《「對華國際時期」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中國》，馮環瑗譯，《冷戰國際史研究》2011 年夏季號，第 92—102 頁；Bernd Schaefer, “Ostpolitik, ‘Fernostpolitik’, and Sino-Soviet Rivalry: China und the Two Germanys,” in Carole Fink and Bernd Schaefer, ed., *Ostpolitik, 1969-1974: European and Global Respons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29-147; Marcel Bode, *Die Beziehungen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gegenüber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in den Jahren 1978 bis 1990. Handlungsspielräume und ihre Grenzen in Politik und Ideologie*, Masterarbeit, Universität Potsdam, 2013.

1 在國內已出版的研究專著中，述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關係的有：吳景平：《從膠澳被佔到科爾訪華——中德關係（1861—1992）》，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年；潘琪昌主編：《百年中德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 年；裴堅章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 1 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年；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 2 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年；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 3 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 年。

1 這方面的研究有：陳孜：《中蘇破裂背景下的中國和民主德國關係（1964—1966 年）》，《當代中國史研究》2012 年第 3 期；《中國同聯邦德國關係正常化過程中的民主德國因素》，《當代中國史研究》2013 年第 6 期；《兄弟鬩牆：中德在 1963 年統社黨六大前後的鬥爭及其影響》，《德國研究》2015 年第 4 期；《蘇共二十大後德國統社黨對中共經驗的引進——羣眾路線在民主德國研究之一》，《冷戰國際史研究》2016 年夏季號；《中共經驗在民主德國的終結與中德關係的惡化——羣眾路線在民主德國研究之二》，《冷戰國際史研究》2016 年秋季號；《一九六一年中德關係變化背景下的馬特恩訪華》，《中共黨史研究》2017 年第 4 期；《新中國對歐公共外交的開端——以萊比錫博覽會為中心的考察》，《中共黨史研究》2018 年第 2 期；童欣：《1961 年賀龍訪問民主德國——兩國關係惡化中的關鍵一環》，《冷戰國際史研究》2014 年夏季號；《中國未參加一九六二年萊比錫春季展覽會原因探析》，《中共黨史研究》2019 年第 6 期；《蘇東「對華國際」瓦解始末——以中國與東德關係為中心》，《二十一世紀》2023 年 2 月號；Zhong Zhong Chen, *Defying Moscow, Engaging Beijing: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s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80-1989*, Ph.D. dissertation,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014.

2 之所以強調「東德史」而非「民主德國史」的原因在於：「民主德國史」這個概念是無法覆蓋戰後蘇聯佔領德國東部地區之間進行管制的這 4 年（1945 年 5 月—1949 年 10 月）歷史。德國史學界的解決辦法則是使用「蘇佔區 / 民主德國」(SBZ/DDR)。這樣的概念在中文表達上顯得過於冗長。因此使用「東德」這個概念去涵蓋「蘇佔區」與「民主德國」這兩個概念至今看來仍然是比較合適的。

3 截至 2016 年 1 月，德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自 1990 年以來出版的有關東德史的書籍總數約有 7000 冊。Ulrich Mählert, „Totgesagte leben länger. Oder: Konjunkturen der DDR-Forschung vor und nach 1989,“ in Ulrich Mählert, hrsg., *Die DDR als Chance: Neue Perspektiven auf ein altes Thema*, Berlin: Metropolis Verlag, 2016, S. 9.

第一部分是德國聯邦檔案館民主德國政府部門檔案（Bundesarchiv, Abteilung DDR），這部分檔案主要收藏蘇佔區和民主德國時期各類中央職能部門的文件，但不包括國家安全部文件、外交部文件以及國防部文件，本書主要利用了這一部分所收藏的民主德國外貿部的文件。

第二部分是德國聯邦檔案館附屬的民主德國政黨與羣眾組織檔案基金會（Stiftung Archiv Parteien und Massenorganisationen der DDR im Bundesarchiv）（簡稱 SAPMO-BArch）所負責整理的德國統一社會黨檔案（全宗號：DY 30），是本書研究中利用較多的檔案。其中主要利用了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文件、國際聯絡部文件、總書記¹瓦爾特·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的辦公室文件。

第三部分是德國外交部政治檔案館前民主德國外交部檔案（Politisches Archiv Auswärtiges Amt, Bestand des Ministeriums für Auswärtige Angelegenheiten der früheren DDR）（簡稱 PA AA, Bestand MfAA）。其中的中國部分文件也是本書研究的主要史料來源，包括了民主德國駐華使館與本國外交部之間的往來電報、駐華使館發回國內情報和以及與中國領導人和在華其他國家領導人的談話紀要。

第四部分是一些已刊的檔案文獻集。德國學者維爾納·邁斯納（Werner Meißner）主編《民主德國與中國：1949—1990》是第一部有關民主德國與中國關係史的檔案文件集，²它是由著名德國漢學家羅梅君（Mechtild Leutner）所主持的中德關係檔案叢書其中的一卷。這部文件集的特點在於它試圖收集來自中德兩國的檔案文獻，不過可惜其中所收集的中方文件主要是來自於《人民日報》《新華月報》以及當時中國外交部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條約集》等

公開文獻，史料價值有限，因此，本書仍主要利用這部檔案集所收集的德方檔案。此外，本書還利用了德國學者哈拉爾德·默勒（Harald Möller）編輯的一本有關中國與民主德國關係檔案的小冊子。¹

總體而言，本書所引用的德方檔案的範圍和比率將高於中方檔案。其原因在於無論從解密開放的程度還是利用的便捷性來看，德方檔案都要優於中方檔案。但中方檔案的重要性在於它們往往能夠在史實辨析和論證過程中提供關鍵性的史料，從而達到史學研究中雙邊檔案互證的效果，這也使得研究者在使用德方檔案情況下所得出的結論，經常會得到中方檔案的修正，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一些基本史實的還原。

在本書所利用的中方檔案中，最具突出價值的是中國外交部檔案館所藏涉及與民主德國關係的外交檔案，它們為本書在史實敘述上提供了許多重要的關鍵性史料。但是，由於一些客觀原因，檔案的開放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本書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比如，中國外交部檔案館的館藏僅開放 1965 年以前的檔案文件，這就使得本書的研究也只好截止於 1965 年。

中方原始檔案文獻的不足需要依靠已出版的檔案文獻集予以彌補。比如，在討論中德經貿關係方面，由中國社科院和中央檔案館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是一套十分重要的檔案文獻集。此外，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央檔案館主編的各種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重要領導人文稿，以及重要領導人的年譜也都是非常重要的檔案文獻。不過，在利用這些文獻時，研究者需要十分仔細地進行閱讀，因為往往一些與本書主題相關的檔案文獻很容易被忽略掉，它們有的很難從文獻編者所設置的標題上直接獲得反映，有的則隱藏在編者的註釋內。

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為例，1953 年 10 月，毛澤東曾就中國向民主德國的農副產品出口作過一個指示，同時，對民主德國國內形勢和德國問題的性質提出過他的一個基本判斷，但這些相關內容卻隱藏在毛澤東就國內土

1 在德國統一社會黨內，這個職務名稱經歷了一個變化過程：1950 年 7 月 25 日，烏布利希當選為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Generalsekretär），1953 年 7 月 26 日後，此職務改稱為第一書記（Erster Sekretär）。1971 年 5 月 3 日，埃里希·昂納克（Erich Honecker）繼任第一書記，1976 年 5 月 22 日後，此職務又再改稱為總書記。本書在提及這一職務時，嚴格按照該職務當時的名稱。

2 Werner Meißner, hrsg., *Die DDR und China 1949 bis 1990: Politik-Wirtschaft-Kultur; eine Quellensammlung*,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5.

1 Harald Möller, *DDR und VR China—Unterstützung der VRCH auf politischem, ökonomischem und militärischem Gebiet (1949–1964): Eine Dokumentation*, Berlin: Verlag Dr. Köster, 2003.

產和副食品經營問題給陳雲、鄧小平的一封信內，從目錄標題中無論如何都難以發現其中的奧妙。¹ 又比如，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中，涉及處理對民主德國貿易虧損的問題，編者在註釋內附加了中國外貿部關於此問題給周恩來的報告以及外貿部與民主德國駐華大使之間的通信。² 這對於理解該問題的來龍去脈是十分有益的。因此，面對中國重要領導人的檔案文獻，只有通過逐句地細讀才能將其中有價值的史料最大限度地發掘出來。這無疑對於研究者挖掘史料的功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研究的主要內容

二戰結束後，作為建立新政權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之間外交關係的當然應從 1949 年 10 月開始算起。然而，如果從 20 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視角來觀察，就可以追溯這兩個國家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與德國統一社會黨（它的前身主要是德國共產黨）在歷史上的淵源。其中可以發現，在 20 世紀上半葉中國共產黨進行革命鬥爭的道路上，多位德共黨員留下了他們的足跡，令人既感動又唏噓。

不少秉持着共產主義理想和國際主義信念的德共黨員，積極投身於中國的革命事業當中，甚至獻出了自己的生命。當第一次革命統一戰線結成後，中國的革命事業便成為了世界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得到包括德國共產黨在內的世界各國革命黨的關注與支援。除了聯共（布）以外，德共是給予 1925—1927 年間的中國革命以最大支援的共產黨。³ 在 1927—1928 年間，德共黨員海因茨·諾伊曼（Heinz Neumann）作為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

表協助了南昌起義，直接參與了廣州起義，起義失敗後回到莫斯科，繼續在共產國際內擔任有關中國的工作。同一時期，里夏德·施塔爾曼（Richard Stahlmann）領導了共產國際在中國執委會的地下工作。漢斯·希伯（Hans Grzyb），這位 1919 年入黨的德共黨員，1925 年在廣州擔任記者，參與了革命統一戰線的工作，撰寫了大量的有關中國革命，尤其是有關中國農村狀況的文章。1941 年他在山東省參加當地的抗日鬥爭，是年 11 月 30 日犧牲，他是唯一的一名在中國革命武裝鬥爭中犧牲的德共黨員，山東臨沂的烈士陵園為他樹立了紀念碑。¹

在中共與德共關係歷史上，有一位眾所周知但也堪稱最為「臭名昭著」的德共黨員——奧托·布勞恩（Otto Braun），即李德。他被共產國際派往中國，作為中共的軍事顧問，1933 年 9 月來到中央蘇區，直接參與並指揮了中共革命根據地的軍事活動，之後被認為是黨內錯誤路線的代表，對當時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初期的失敗負有重大責任。² 因此長期以來，在中共黨史的敘事中，李德一直是一個典型的反面人物和受批判的對象。且先不論上述諸位德共黨員對中國革命所起到的作用是積極的也好，消極的也罷，至少他們在中國革命史上所留下的印記，構成了德共與中共關係歷史的一部分，進而構成了 1949 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這兩個新興國家關係的歷史淵源。

1 《關於重要土產和副食品的經營問題給陳雲、鄧小平的信》（1953 年 10 月 16 日），載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8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 年，第 486—487 頁。

2 《關於在對德貿易中虧損處理問題給毛澤東等的電報》（1953 年 3 月 5 日、4 月 12 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 8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 年，第 159—168 頁。

3 Joachim Krüger, „Die KPD und China, 1921–1927,“ in Mechthild Leutner, hrsg., *Rethinking China in the 1950s*, Münster: Lit Verlag, 2007, S. 107.

1 關於德共黨員參與中國革命的一些情況，參見民主德國最後一任駐華大使羅爾夫·貝特霍爾德（Rolf Berthold）的敘述：Rolf Berthold, *Chinas Weg: 60 Jahre Volksrepublik*, Berlin: Verlag Wiljo Heinen, 2009, S. 236–237, 246–253. 關於施塔爾曼和希伯的事跡，還可參見李向前：《歷史穿行：域外訪史與社會主義尋踪》，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65 頁，但其中稱希伯犧牲於中國的解放戰爭中，這一表述似乎有誤。

2 《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1935 年 1 月 17 日），載石志夫、周文琪編：《李德與中國革命（有關資料）》，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第 16 頁。對於李德的責任，可能還需要另一位德共黨員曼弗雷德·施特恩（Manfred Stern）來承擔。施特恩即弗雷德，1931—1934 年間他受共產國際的指派，擔任中共的軍事總顧問，是李德的頂頭上司，在一些問題上李德與其有着較大的分歧。後來李德曾抱怨過，自己其實是在替弗雷德受過，似乎弗雷德更應為蘇區的軍事失敗負責，從而迴避了李德自己所應負的重大責任。參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年，第 68 頁；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李達六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 年，第 31、35、77—78、124 頁。

〔冷戰年代的世界與中國〕

陌生的兄弟：

中國與民主德國關係史初探（1949—1965）

沈志華 主編 葛 君 著

責任編輯 俞 笛

裝幀設計 鄭喆儀

排 版 賴豔萍

印 務 劉漢舉

出版 開明書店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一樓 B
電話：(852) 2137 2338 傳真：(852) 2713 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wabook.com.hk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荃灣德士古道 220-248 號
荃灣工業中心 16 樓
電話：(852) 2150 2100 傳真：(852) 2407 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觀塘榮業街 6 號 海濱工業大廈 4 樓 A 室

版次 2024 年 7 月初版
© 2024 開明書店

規格 16 開 (240mm×160mm)

ISBN 978-962-459-357-0

